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

青 少 年 读 本

主
编：郭莹

四书选读

杨和 李毅荣 邓玲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B222.14

Y152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

编委会 冯芳华 周积明 陆才坚
郭莹 何晓明 钟年

(青少年读本)

四书选读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组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QA028/33

601812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选读/杨昶,李毅荣,邓玲编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郭莹主编)

青少年读本

ISBN 7-5351-2635-9

I. 四… II. ①杨… ②李… ③邓… III. 四书 - 青少年读物 IV. 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468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黄冈日报印刷厂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字数:179 千字

(438000 · 黄冈市八一路 7 号)
4 插页 9.75 印张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7-5351-2635-9/G · 2143

定价:15.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传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虽然人们总是把它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来看待，但却无法割断与它的血肉联系。即使侨居国外多年者，如张爱玲，我们也仍然可以从他们的呼吸中嗅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是的，这就是传统，一个民族无法割离的生命之根。无论它在现代社会遇到多么强劲的挑战，无论人们如何对它实行“现代性的转换”，它始终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方式。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谓“中国的智慧”，其根底必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

面对这样的文化必然，我们怎能对传统漠然？无论是为了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古老的智慧，还是要解决“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的现在是什么？我们最终如何生存”这样的终极性问题，我们都应该去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途径之一便是读一些经典性的中华文化典籍。在这些典籍中，你将会发现，其中的很多思想，不仅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且仍然

在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就是为如上文化目标而设计的,它的编者是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该所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中,不仅高度注重学术创新与开拓,出版了《中华文化史》、《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知识分子命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文化之道》等学术专著,而且还十分注意文化的传播与普及,组织编撰和出版了《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古都》、《中国传统文化浅说》、《中国智慧集萃丛书》、《中国古典小说谈丛》、《中国社会生活谈丛》等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著作。《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正是后一系列的续作。本书系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精选中华文化典籍,各书选取代表性篇章,加以导读。所依版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准确性;选编内容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我们热诚希望这套丛书能为青少年朋友以及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开启一扇通往中华文化瑰丽殿堂的扉扉。

导 言

“四书”是中国古代儒家奉为经典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称，亦称“四子”、“四子书”。

儒家的经书，孔子之前有六部，即《诗》、《书》、《易》、《礼》、《春秋》和《乐》，其中《乐》经失传于战国时代。因此汉武帝立经学博士，只有“五经”的名目。后世经典的范畴渐广，便有了“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称。宋代以前，《礼记》、《论语》已被尊为经典；而在较长的时间内，《孟子》隐于诸子之林，在儒学中的地位是不高的。自唐代韩愈最先推崇《礼记》中的《大学》篇，李翱又特别表彰《礼记》中的《中庸》篇，二者遂为世人所重。宋代理学家开始重视《孟子》，致使这部“子书”突然显赫起来。统治阶级便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提，给予与“六经”等侔的地位。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将这四部著作分别逐章断句，加以注释，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之名称开始流行。《四书章句集注》刊行于南宋绍兴元年（1190年），从此便被定为正统儒学教育的必读书。元朝元祐年间，朝廷明令以朱熹的这个本子来命题考试士子，

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定制，故《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书，即文人士子应举求仕的基本教材。“四书”及其“集注”可谓是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纲领性著作，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长达七百年，影响久远。“四书”的这一特殊地位，也是今人对它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下面分别介绍这四部著作并探讨其文化价值。

一 《大学》和《中庸》

《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当代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此书作于战国时期，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大学”，意为有关政治、哲理的博大学问，即儒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学说。

《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经”是基本观点，“传”是对于“经”的解释、阐述。这一章次，是由朱熹重新编定的。朱熹除了给《大学》注解外，还给每章加了简短的提示。书中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还论列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对这些纲目，《大学》作了详尽的阐述，从而形成后世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儒家学派奉为主臬的最高政治理想。因此，学习儒家经典，必须从《大学》入手。

该书认为“修身”的重要途径是“致知在格物”。汉代郑玄在《礼记注释》中讲解道：“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格，是招致、引来的意思。物即事。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善，就会引来善事；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

恶,就会引来恶事。即人的思想追求会引导事的发展方向。”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郑氏解释又作了较符合原义的引申疏通。《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根据二程(程颐、程颢)的观点,对“格物致知”作了新的诠释。朱熹认为,“格”是探究、穷尽,“物”是事物,“致”是推极,“知”是认识。“格物致知”是说,人在与事物接触时,要穷尽事物所含的道理,才能认识完全,达到顶点。这里,“格物”成了“知”的手段。“格”不是指人在实践中对于自然社会“物”的考察,而是以“诚意”、“正心”为内容的心理体验。“物”也不是原来所指的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而是指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所以,所“致”的“知”并不是对自然、社会中客观规律的认识,而是恢复一个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朱熹的“格物致知”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努力消除恐惧、愤怒、好乐等多种感情,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把个人修身的好坏看做政治好坏的关键,强调道德修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学》还强调“齐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提倡孝、弟、慈,认为协调这些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协调国家中的君与臣、君臣与民的关系。这样就将家族中的宗法治理与国家政治的实施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范式。

《中庸》一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阐述儒家学派的修身观点。相传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所著。

子思(前 483—前 402),姓孔,名伋,战国初年哲学家。其思想后来被孟子承袭(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加以

发挥,形成思孟学派。后代尊称子思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已佚。而现存的《中庸》篇,已被秦初的儒生修改,大约写定于秦并天下后不久。

“中庸”也称“中和”,从字义来理解是折中平常之意,篇中指出,“中”是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之情,心中平静澹然的状态;情感表露出来后,将它整饬得符合常理就称为“和”。达到“中和”的境界,便能形成天地正常运行和万物生长发育的局面,国家也就长治久安了。

儒家学派认为,“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通贯天下的原则。于是“中庸”就成了最高的行为规范,人们追求的美德。篇中要求人们恪守“中”道,在好、坏两个极端之间“用其中”,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这种不偏不倚的折中观念,是要求人们安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得有越位非分的举动:居上层者不骄矜简慢,居下层者不企妄攀援,只是端正自己却不会责求他人,不怨天尤人。子思还认为,“中庸之道”只有君子才具有,小人则加以违反。即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显然是作者美化统治阶级的偏执之言。

至于在政治上如何施行“中庸之道”,篇中认为就是要适当地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具体原则包括以下方面:尊重贤人,亲爱亲族,恭敬大臣,体谅小臣,爱护平民,招集百工,安抚远人,取信诸侯;对百姓要按照时令役使,收取微薄赋税;嘉奖有才能的人,同情才能欠缺的人;以及继绝世,兴灭国,等等。

篇中还把“诚”视为“中庸”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这些话都反复强调着“诚”的重要意义。本来，“诚”是精神的东西，是由存在决定的，但是作者认为，“诚”是先天的原则，人的本性，“诚”能“成物”，“不诚无物”。这就把世间万物的存在，说成是由主观的“诚”所决定的，即精神产生物质。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当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作者又认为，极端“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本性，感化人群，与天地并存，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典范。人们不难据此追寻儒家把“诚”作为“君子之所守和政事之本”的思想渊源。

《中庸》是一篇带有唯心主义观点的儒家哲学著作。它要求人们向着折中平和、不偏激、不背叛的方向修养，从而能自觉遵循和服从现存的社会秩序。就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基本上与之相适应，因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庸》能认识到事物矛盾的统一性，这是十分可贵的。世界本是充满矛盾的，矛盾的对立双方既斗争又统一，且通过斗争达到新的统一，新的统一又孕育着新的矛盾。《中庸》从矛盾的统一性方面着手，提出解决纷繁的社会矛盾的方法途径，颇有见地。然而，它片面夸大统一性在矛盾发展中的作用，忽视矛盾双方的对立，贬低矛盾的斗争性，因而在认识论上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中庸》阐发的其他一些政治哲学观点，对后代的哲学、政治、文学、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篇中所积淀的古代统治者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政治经验和对于人类道德修养的名言卓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意义，

至今仍是可供鉴戒的宝贵遗产。

《大学》和《中庸》均出自《礼记》，故《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我们估价这两个名篇的主要依据。当代有位学者曾作过这样一个非常中肯的断语：“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大学》和《中庸》占“四书”之半，颇能体现《礼记》这部造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籍的价值和特色所在。

二 《论语》

《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兼记孔门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集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的称号于一身，是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伟人。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早年曾任鲁国的委吏（仓库会计）、乘田（管理畜牧）一类小官，三十岁左右开始收弟子讲学，五十岁左右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后离开鲁国，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力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未果。晚年归鲁聚徒讲学，并整理删定文化典籍。后世尊其为“圣人”。

孔子整理经典文献，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孔子自己并没有著作传世——当时还没有私人著述的风气。幸亏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他的言论记

录下来，整理成《论语》一书，才使后人能够领略他的风采。《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纂辑的意思。《论语》的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即公元前400年左右。全书二十篇，各取篇首的二三字为题。《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章与章、篇与篇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并且有重复的章节出现。

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他的政治主张也四处碰壁。但是自汉代以后，孔子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独尊，并经历代儒家思想家的补充改造，日益系统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作过一个有趣的对照：“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与孔子的圣人地位相适应，《论语》成了中国人的圣书，厕身儒家经典，收于“四书”之列。在人们的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北宋名相赵普少时为吏，读书不多，后潜心研读《论语》，从政治国得心应手。赵普曾对宋太宗赵光义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由此世传“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除了适合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内容之外，内蕴丰富的《论语》给予后人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兹试述一二。

在如何对待鬼神的问题上，《论语》主张“敬而远之”。子路曾求教事奉鬼神之事，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求教死的问题，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先进》)樊迟询问怎样才算是智慧,孔子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有智慧。(《雍也》)孔子素来不议论怪异、鬼神一类事情,当他身患重病的时候,还阻止弟子为他向天神地祇祈祷。(《述而》)世界上有无鬼神存在,孔子并不去深究,对此的认识是模糊的。但是他又表现出了一种睿智的观念:较之虚无缥缈的鬼神世界,现实世界要实在得多,重要得多,一个人应重视生前而勿论死后,要治理民众就要回避鬼神而把精力放在人事上。这种通达务实的见解,为历代有识之士嘉许、承传,成为抵制、摒弃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武器;使得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域外传入的佛教、基督教,都在中国淡化了影响力,远未能取得它们在许多国家所据有的那样显赫的地位。

在教育方面,《论语》记载了孔子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思想理论。孔子主张德育为先,全面发展。提出“有教无类”(《卫灵公》),并亲自实行,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格局,使文化下移,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教学有明确的针对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也多有精辟之言,如“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等等。他还重视文学作品的政治和教化作用,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可以算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了,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及文学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语》还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语言精练含蓄,富于

概括性,带有很强的口语化特征。有些语句既形象,又富于启发性和哲理性,常常被后人引用,演变为不朽的成语或格言。

三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 372—前 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他是春秋时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母亲对他管教甚严,遂由厌学顽童转变为好学少年。传世佳话“孟母三迁”、“断织教子”,为中国家庭教育展示了很好的典范作用。孟子非常敬仰孔子,认为学习孔子学说乃平生所愿。他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以“孔尼之徒”自居。学成之后,他效法孔子,游历齐、宋、滕、魏、鲁,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向各诸侯国君王宣传自己的王道、仁政纲领,曾一度担任齐宣王客卿,但最终不为时君所用。晚年,孟子回归故里,授业讲学,并与门徒万章、公孙丑、乐正子等著书立说。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

《孟子》一书,一般认为是孟子与门徒合著而成,也有人认为是孟子死后由门徒整理成书的。书凡七篇,每篇又各分上、下。在篇名和体裁上,它都与《论语》有相似之处,如各篇没有标示篇旨或进行概括的特定题目,而是以每篇第一章中开头或其中的几个字为题;一篇之中所收的各章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孟子》较之《论语》,又把语

录体例的散文向前大大地发展了。《论语》对话简短,文字含蓄,而《孟子》则规模宏大,洋洋洒洒。《孟子》的篇章结构精密严谨,内容充实宏博,主题集中,推理缜密。其中许多论辩,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而又畅达明晰、利足断金;在争辩中善于欲擒故纵,引人入彀,用语生动,言辞精当。《孟子》以其特有的气势雄浑、博大深刻,而与汪洋恣肆、诡谲怪诞的《庄子》并称为先秦哲学散文中的双璧,对于后世散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出发,对人的问题,作了更加系统的深入探究。他对人的本性进行哲学思考,并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先秦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学体系,即《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春秋战国之际,天命神权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人们开始摆脱神的桎梏而逐步解放出来,探讨自身的本质与价值。孔子首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指出人性生来是相近的,而后天习染使人的素质相去甚远。其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纷繁的社会斗争更驱使人们全面考察人的本性、价值以及和现实的联系,形成“百家争鸣”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的思想家对人性的定位主要有四:其一人性不善又不恶,其二既可善又可恶,其三人性善,其四人性恶。孟子持性善论,为此曾与告子相驳难。告子主张人性没有先验的善恶之分,如同水一样,引其往东就东流,引其往西就西流。孟子也用水的流向论辩:“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告子上》)认为水总是往下流的,人性也总是善的。《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性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四种本能——“善端”所决定的,而“善端”便是

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萌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将“善端”加以推衍，就形成人类共有的道德观念。然而，《孟子》构架的人学体系，并没有到此为止，当书中系统阐述了“成己”与“成物”、“内圣”和“外王”两方面时，人们方才识得孟子学说的主体。

《孟子》展开论述道，“善端”虽系人所固有，但现实社会中并非人人都拥有仁义礼智“四德”。这是由于“善端”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的事物，离开了“求”就不可能将“善端”发展起来。所谓“求”，既是一个发现“善端”的认识过程，又是一个发挥“善端”的修养过程。此为“成己”、“内圣”的一面。在用大量篇幅讨论人如何发现和发挥善的本性问题之后，书中又主张把个人自身的性善，推及他人，形成仁政。此为“成物”、“外王”的另一面。《孟子》指出，有两种统治民众、治理国家的体制，或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或是“以道服人”的“王道”。孟子从性善论出发，高扬“恻隐之心”，推崇“王道”，屏斥“霸道”，主张实行“仁政”，要求统治阶级待民以“仁爱”之心，并拟定了一套保证民众最起码的劳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土地制度方案，以保证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寻求更理想的途径。

与“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相配合，《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书中写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

胜矣。”(《公孙丑下》)国家统治的巩固与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因此统治者必须重视民众的权利和作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民众比国家、帝王更为重要。他提醒统治阶级以民为本,切不可暴政虐民,动摇国家根基。

《孟子》丰富的思想内容,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制民之产”的井田制方案,实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将施行“仁政”的希望,寄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

《孟子》对后人产生良好影响的菁华甚多。如书中力倡的“浩然之气”,曾激励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树立理想人格,培养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造就了许多民族英雄和志士。南宋文天祥抗元兵败系狱,高吟《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中国共产党人也曾从《孟子》中汲取养分。刘少奇所撰《论共产党员修养》就多处征引《孟子》中的名言卓论,用于教诲党员要加强自我修养。

至于《孟子》中的民主性成分,更有超迈时代的深远意义。相传致力于加强专制皇权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读到《孟子》中的有关观点时,怒不可遏,竟下令删改此书。此事充分显示了《孟子》对极端专制主义的抵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王朝,间或出现“清明盛世”,偶有体察民间疾苦的“圣主谏臣”,不能不说与《孟子》有关。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启蒙思想家多垂青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